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学术基金赞助

AN EFFECTIVE LABOR THEORY OF VALUE

有效劳动价值论

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

Discerning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Based on Coordination

朱富强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有效劳动价值论

——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

朱富强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 / 朱富强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2
ISBN 7 - 5058 - 4517 - 9

I. 有… II. 朱… III. 劳动 - 价值论 - 研究
IV. F01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022 号

责任编辑：周秀霞
责任校对：杨 海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有效劳动价值论

——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

朱富强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esp. com. 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开 10 625印张 300000 字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 200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 - 5058 - 4517 - 9 / E · 3789 定价：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笔者近四年来“形而上”思想的产物，也是笔者以协调为视角发散思维的一部分。它最初源于博士论文《博弈、协调与社会发展》构思期间形成的一个基本视角，工作的这几年笔者又作了更深入的思考，从而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形成了系列研究。实际上，《博弈、协调与社会发展》为以协调为视角的经济分析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而其他研究则是将该框架中所涉及的某一部分细化，如本书就是从协作系统的协调角度分析社会化生产中的价值创造问题。其基本的逻辑前提和思路是，应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将传统价值理论的不必要假设逐步砍去，从而发展出有效劳动价值理论。

第一章是对马克思传统劳动价值理论的解构。首先从价值的衡量出发指出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内涵的悖论，并且挖掘产生悖论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之所以用自然时间作为价值的衡量尺度，在于其基本前提是把劳动都当作简单同质的；尽管这种同质化抽象在早期社会也许还可以说得过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抽象并非是符合现实的抽象；这意味着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仅仅是适用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狭隘理论。而且，除了同质化假定外，马克思考察的劳动也是孤立的直接生产劳动，它既不符合社会迂回生产的事实，也无法解释团体合作生产与孤立生产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此外，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尺度，这种度量也是静态或比较静态的，无法对社会

的长期发展作出动态分析。

第二章是有效劳动价值理论的构建。首先我们把劳动从简单拓延到异质复杂劳动的分析上，特别从横向和纵向比较的角度考察异质劳动所创造价值的差异，通过引入有效劳动和有效劳动时间等概念，提出了劳动价值的一般理论——有效劳动价值说；这个学说不但可以解释异质性劳动价值创造的差异问题，而且可以分析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类型劳动的性质，并且为社会发展从劳动价值的角度提供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此外，通过对有效性的解释，我们可以考察其他一些不创造价值的劳动，从而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更全面的衡量。

第三章是应用有效劳动价值理论提出判别社会劳动性质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凡是直接生产性的劳动支出以及有助于提高直接生产性劳动的有效性的劳动就是创造价值的；反之，如果只是促使创造价值分配和转移的劳动就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个原则不但可以分析具体的劳动，分析各类劳动的兴衰，而且，我们还将社会非直接的劳动分成两个基本类型：协调劳动和监督劳动。其中，协调劳动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而监督劳动则应该是一个社会通过各种机制（如制度规章、道德伦理）要努力减少的，因为监督劳动是在通过改变其他生产性劳动支出量的情况下增减社会价值总量，而协调劳动则是在不改变其他生产性劳动支出量的情况下增加了价值的创造。

第四章是对社会协调机制历史演变的考察。实际上，将有效劳动价值理论应用于分析团体生产的价值创造时，就涉及劳动间的协调问题；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间的协调逐渐成为价值的根本来源。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梳理了协调机制演进的轨迹：缘协调、契约协调、管理协调和社会协调；与此相对应，产生了人类基本组织的演进：以家庭为代表的缘协调组织、以分包制为代表的契约组织、以科层制为特征的企业组织以及扁平式的网络组织。

第五章从协调出发考察三类有形资本对价值创造的作用：物质资本、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本。实际上，它们都是凝结形态的人类物化劳动，其在生产中同样起到创造价值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本章

系统地考察了三类资本的起源和在人类生产中的作用，最后比较了三者的异同。

第六章是从协调出发进一步考察另外三种无形资本对价值创造的作用：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本，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处于流动形态的物化劳动，通过分析它们的形态、特性和对价值创造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最后一章从物化劳动的形态演变出发，特别是根据各类具体物化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同，根据历史演进的逻辑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劳力社会、地力社会、资力社会、智力社会以及协力社会（或称序力社会）这几个阶段。这样划分的人类历史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延性特点，而较少出现跳跃性的现象，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一般总是从低级向高级推进的；根据这个规律，本章又进一步考察了智力社会的特征以及起飞时对物化劳动积累的要求。

目 录

0. 树立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态度（代前言）	1
0.1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所应有的基本要求	2
0.2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应有的学术态度	9
1. 传统劳动价值理论的解构：对自然时间作为价值衡量尺度的质疑	19
1.1 传统劳动价值理论的反思	21
1.2 传统价值理论在量规定上所体现的“悖论”	35
1.3 自然时间不能作价值的衡量尺度	40
1.4 日益异质化的社会劳动不能作同质化处理	45
1.5 商品价值量与生产力成反比论断之缺陷	56
2. 劳动价值一般理论的构建：考虑劳动的有效性因素	63
2.1 构建劳动价值一般理论的思路	65
2.2 使用价值、价值和财富的关系	73
2.3 劳动价值产生的真正来源	83
2.4 劳动价值一般理论的构建	91
2.5 社会总体价值量的衡量	98

3. 劳动性质判断的基本原则：兼评协调和监督劳动的性质	107
3.1 有关劳动性质理论的文献回溯	107
3.2 马克思理论对劳动性质划分的缺陷	116
3.3 判断社会劳动性质原则的构建	124
3.4 协调和监督两类基本社会劳动的性质	132
3.5 奴隶制高效率及奴隶劳动衰亡的解释	145
4. 协调演进：价值创造不断扩展之源	152
4.1 协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意义	152
4.2 从协调演化洞悉分工效率	159
4.3 协调增进和组织形态的联系	176
4.4 协调机制和组织演变的历史轨迹	180
5. 物化劳动与价值创造：兼论三种主要资本形态的内涵	189
5.1 物质资本含义及其对价值的创造	191
5.2 土地资本的概念修正及价值创造功能的考察	201
5.3 人力资本的真实内涵及其价值功能	211
5.4 三种有形资本的性质比较	219
5.5 两个传统观点的反思	225
6. 流动形态物化劳动的价值创造功能：知识、伦理及组织制度的性质	231
6.1 知识资本的含义和价值功能	232
6.2 社会资本的含义和价值创造功能	242
6.3 制度资本的含义和价值创造功能	256
6.4 三类无形资本的特性比较	263

7. 物化劳动具体形态的历史演化：一种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观	269
7.1 传统社会阶段划分的困惑	270
7.2 社会阶段划分的新视角	280
7.3 中国史的案例分析	290
7.4 当前经济发展对物化劳动凝结形态的要求	301
 结语	 314
主要参考文献	316
后记	329



树立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基本态度

(代前言)

本章反映了笔者对待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具体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就产生了一些感悟，这种看法和态度也成为本书写作的基本精神。因此，这里权且把它作为本书的前言，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写作和研究的基本思路。

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的分离，但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就研究内容而言，西方经济学偏向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研究稀缺性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关心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资源的分配。就研究方法而言，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理性的人如何行为，特别强调功能性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希望探究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注重的是因果分析。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走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要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从这点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尽管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但是，由于长期的墨守成规导致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

在当前的急剧衰落。我们现在必须具有真正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

0.1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所应有的基本要求

在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宏观性的，它缺乏直接的致用性，学习政治经济学主要的收益在于为学生提供一种观察社会的视角和方法。因此，就教师的职责而言，授课必须对学生具有某种启迪。为达到这一目的，笔者认为教授政治经济学时，教师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0.1.1 教学方式要由灌输式向启发式转变

当前，高校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比较难上的，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政治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纯理论的课程，理论课本身很抽象；在当前经济浪潮狂袭的时代，大部分人都充满近视的功利态度，心境浮躁，对纯理论的东西都抱有空洞、乏味的感觉。其次，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经比较熟悉了，再来学一遍，普遍认为缺乏新内容，把时间花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很低。最后，目前流行的是“西潮”，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马克思的理论越来越“古董”了。

正因为当前的学生普遍存在上述心态，这就要求教师加以正确的引导，在教学时加以疏通，释去学生的疑义。首先，应该让学生明白，学习本身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需要静下心来，特别是研究生，未来应该算是知识阶层，就更应该学点理论，多点思想，这是人生的精神方面。实际上，许多东西只是由于不了解才没兴趣，了解越多兴趣才越大，而“专家”就是这样“炼成”的。至于教授的内容，不能再沿袭传统没有层次的教材了，必须提高研究和传授的深度，尽量增加一些新的看法、新的思考，教师要珍惜学生的时间，不要让他们感觉是被强制的枯坐。

事实上，目前中国学术界也出了几本高级政治经济学，但大多是把传统的理论和从西方经济学中搬过来的内容混杂在一起而已。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的探讨，本身包含了不同社会主体的能动解读，因此，随着我们对社会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不同主体解读的程度和角度的不一样，这就需要教师在这方面能够有所引导。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在更大程度上是思想启发性的，高级的政治经济学课程需要就一系列问题作广泛深入的讨论，这才是研究生课程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本色。正是通过积极的思辨和争论，一方面我们可以剔除理论中存在的过时部分，同时，也可以挖掘出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髓。在此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切勿人云亦云，既不是经院式态度也不是虚无主义态度。毕竟马克思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如果马克思只是一个空泛的布道者，到现在他早已默默无闻了”（熊彼特，1999，p. 46）。

当然，要转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成见，培养学生的兴趣，增益学生的收获，提高学生的能力，开阔学生的思维，就必须转变我们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代之以积极的启发式的思维，提倡自由的思辨，毕竟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可能太“一本正经”了。实际上，启发式和灌输式是教学的基本方式，根据教师习惯方式的不同，哈耶克（2000a）将教师区分为“专业师傅”和“冥思苦想者”两种类型。“专业师傅”对某一门学科的所有理论、各种细节都了如指掌，并按照习惯的传统方式一代一代地传授知识；而“冥思苦想者”则有违一般传统，他总是走自己的路，发现新的事物，并告诉学生他的新发现、新体会以及新的疑义。在现代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好教师已不再是符合传统标准的“专业师傅”，而是要有创见，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哈耶克认为他自己就属于冥思苦想者。实际上，现代教学质量的好坏已绝不仅是课堂上讲得如何条理清晰，怎样生动、沁人心脾，或者以学生的课堂良好反映而著称，因为再有条理的课也无法与书面文字相比；如果仅仅是复述书本的知识，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在更短的时间内更有效率地看完，其余只要花一些时间就某些不能理解或者具有歧义的问题

题请教教师就行了。

因此,教师更主要的职责在于讲授书上找不到的,要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大家的想像。斯蒂格勒(2001)曾指出,教师的“任务是激发学生们对知识的真诚的好奇心,逐渐灌输一个学者的良知——传授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的大量冒险行为和高尚品行”。国学泰斗陈寅恪先生曾有三个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陈先生是一座“丰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难望其项背。但是,我们要努力从过去无效率的教学中吸取教训,不要让我们一代又一代地遗憾下去。特别是,要尽量提出个人的理解,启发思路,引导讨论。

而要做到启发式的教学关键在于必须对所授学科有比较深的研究,否则只是“文抄公”、“传声筒”甚至“鹦鹉学舌”。所以,斯蒂格勒(2001)指出,“做学问可不是一种能够吸引观众的运动项目”,教师也不应该是一个明星式的夸夸其谈者,“好老师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要在专业领域受到尊敬,就必须是专业化的研究”。如果没有一定的研究,那么就会“教学变成辅导……既是危害平庸之辈,更贻害超凡之士”。

0.1.2 要能够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教学方式转变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教师自己是否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首先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个整体理解,因为评论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否则就是痴人说梦。不管它的观点如何,这都是对待前人理论应有的态度,甚至对敌对观点也是如此,如波普尔(1999a,第二版序言)强调,“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希望战胜对手的话,显然必须下工夫评估他的实力”。我们在对待即使存在某些过时性或缺陷的前人理论,也不能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这是真正搞学问的态度。实际上,在西方即使那些坚决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能如此,如波普尔就在很多方面褒扬马克思的成就,他(波普尔,1999b, p. 140)说:“在把理性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最迫切的问题

上，马克思作了诚挚的尝试。这种尝试的价值没有为这一事实所减损，即正如我将要表明的，它以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成功。科学要经历不断的尝试和错误才能进步。马克思毕竟进行过尝试，虽然他在主要理论上犯了错误，但他的尝试没有白费。他以各种方式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目光更敏锐。退回到前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像的。所有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那些像我一样不赞同马克思的理论的人，情况显得尤其如此；我欣然承认，例如我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研究，就打上了受马克思影响的印记。”

在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后，进一步的要求是挖掘其中的真正精髓。事实上，正如恩格斯（1995a，pp. 742 ~ 743）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林岗等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资本论》的方法”（转引自孟捷，2001，p. 2）。而至于马克思众多的具体理论，它们固然具有很大的创见和意义，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挖掘马克思体系中真正对我们有所启发的东西。实际上，马克思理论的最基本的贡献在于其尖锐的批判性、深刻的分析能力以及充满对人类的关怀。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弗里德里克·詹姆逊，1998），如熊彼特就特别指出，“马克思是天生的分析家，是个被驱使去做分析工作的人”（熊彼特，1992，p. 14），“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惟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熊彼特，1992，p. 96）。马克思分析当时社会矛盾的态度，我们可以借鉴，因为尽管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它的基本形态还存在，因此，尽管我们可能要考虑马克思当时还没有遇到的问题，但是他所提出的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极具功效的。有的学者就指出，“在我看来，最令人发笑的没有条理的表述就是，同时声称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性与矛

盾进行了研究,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世界,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比以往的意义更大”(阿里夫·德里克,1998)。

另一方面,就是他对人类的关怀。我们可以体会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评论,他(1999b, p. 141)说,“如果不承认马克思的真诚,我们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他。马克思的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空言尤其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为世界上反对伪善和法利赛主义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他有着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充分意识到,需要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言词中证实自身。尽管马克思的主要才能是在理论方面,但是为铸造他认为是科学的战斗武器,以改进大多数人的命运,他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特别是在他的青年时代,马克思所处的是一个最无耻和残酷的剥削的年代。伪善的辩护士们居然还以人类自由的原则、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人有自由订立一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契约的权利为借口,为这种无耻的剥削进行冷嘲热讽的辩护”(波普尔,1999b, p. 195)。“如果这种‘基督教’(指早期为资本主义剥削作伪善的辩护的那个时代官方基督教)从我们地球的较好的部分的表面消失了,那么,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马克思所带来的道德改革……如果说基督教今天走向了一条与它30年前追寻过的道路不同的道路,那么,它应该把许多都归功于马克思的影响。基督教会能够听到克尔凯戈尔的声音,部分地也应归功于马克思……可以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的伦理的严谨和它对行动而不是纯粹词句的强调,或许就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矫正理念”(波普尔,1999b, p. 312)。

0.1.3 崇尚价值无涉的风气而不要强制思想统一

能够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价值无涉。价值无涉是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这是对教师所处地位的要求,因为教师不是政客。当然,我们讲价值无涉,并不是说经济学学习不涉及价值判断问题,仅是实证分析,没有规范内容。事实上,经济学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理念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还是主要探讨的

内容；同时，任何人的言谈、行为也必然受其固有的意识形态支配。

我们这里讲价值无涉，主要是指不要用一种价值观、一种标准来统一大家的思想，只希望以学者的良心和态度去观察问题，而价值倾向如何是次要的。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价值观统一，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 and 统一人们的兴趣和信息，就是思想压制，这是社会的最大损失。因为这将直接窒息人的创造性，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可能性，从而毁掉知识。一般来说，价值观越一致，知识的损失就越大；知识的重要性越大，社会经济的损失也就越大。思想自由，就在于在争论中淘汰错误的或无价值的东西，而将精华沉淀下来成为人类的财富，而如果思想压抑的话，只会存有渣滓。这就如企业，如没有正常的出生—死亡机制，就只剩下无效的国有企业；而西方的高出生—高死亡机制保证了有效率企业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沉痛教训，整个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知识和思想呢？

像顾准这样的“中国惟一真正的知识分子”非常幸运地才能留下薄薄札记、几封通信和一些日记。他（顾准，1994，pp. 344 ~ 345）在20世纪60年代就一语中的，“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个领域都不例外”；“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同时，顾准（1994，p. 363）在那个时代还以微弱的声音呼吁，“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陈寅恪之所以伟大，造诣如此深厚，也就在于他能始终保持真正学者的节操。20世纪50年代中央要调他到北京主持一个研究所的工作时，他就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不宗奉马列主义（虽然他也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很有见地）；二是不受政治干扰。其实，马克思（1965b，p. 25）本人就曾坚决主张，“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身也具有教条主义的因子，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构性的；它追求的是完美主义，强调的是运动中的主导性，因而必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这也正是波普尔所极力批判的。别尔嘉耶夫（2000）甚至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相

比较，认为“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出如下的宗教特点：严格的教条主义体系，不考虑实践的灵活性；正统派和异端分子的区分；科学哲学的不可改变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是神圣的，它们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等。虽然我们并不能认同别尔嘉耶夫的看法，但他的看法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真正学术的态度。事实上，正是由于接受的是这种较为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培育，一些人在遇到无法理解的问题时很快就会转变态度，甚至成为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如戈培尔就曾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顾准，1994，p. 359），波普尔、福柯等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别尔嘉耶夫早期也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们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具有开放性，这是它不断发展的要求；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背景的不同，“政治经济学在每一个国家也必然是不同的”（詹姆斯·斯图亚特语，见J. N. 凯恩斯，2001，p. 34）。

然而，这种教条曾是社会主义国家极为严重的通病，学术与政治联结过分紧密，如在前苏联，李森科的生物学观点被共产党委员会批准而赢得欢呼（M. 波兰尼，2000，p. 365）。结果他认为依靠经验而无需通过选种培育出来的小麦具有更强耐冻能力的观点被称为金科玉律，任何人稍有微词或疑义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而成千上万的人也因此被饿死。也正是这种教条主义倾向抹杀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学问精神，学术界也成了机会主义泛滥之所。事实上，自苏东剧变以后，大量的从原来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好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机会主义者马上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和谐的描述；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另一些原来被视为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些坚持个人观点的异议者却依然在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而呐喊，如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四位思想家的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就一以贯之地挖掘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当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危机，就在于我们太在意接受马克思的说教，而没有真正思考他提出的问题，从而窒息了马克思很有创建的思